

罗福腾 主编 ■



新马华文文学研究 新观察

罗福腾 主编
■



新马华文文学研究 新观察

阅览



八方文化创作室

新跃人文丛书

总主编 郭振羽

新马华文文学研究 新观察

主 编	罗福腾
企划编辑	潘国驹
责任编辑	何华
封面设计	何美娇
排 版	李丽芳
出 版	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 461 Clementi Road, Singapore 599491 www.unisim.edu.sg
发 行	八方文化创作室 (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之附属机构) 5 Toh Tuck Link, Singapore 596224 www.globalpublishing.com.sg
联 络	65-64665775 chpub@wspc.com
印 刷	World Scientific Printers (S) Pte Ltd
初 版	2012年10月
国际书号	978-981-4436-02-1 (pbk)
定 价	S\$20
版 权 所 有	新跃大学 八方文化创作室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新跃人文丛书

总主编 郭振羽

副总主编 符诗专 罗福腾

丛书编委会委员

符诗专	新加坡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
郭振羽	新加坡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
李国英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罗福腾	新加坡新跃大学中文课程
王润华	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
徐兴无	南京大学文学院
周建渝	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
竺家宁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中文系

新跃人文丛书之一

《新马华文文学研究新观察》

分册编委会委员

柯思仁	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
罗福腾	新加坡新跃大学中文课程
欧清池	新加坡《新世纪学刊》主编
杨松年	台湾佛光大学中文系

《新跃人文丛书》总序

总主编 郭振羽

《新跃人文丛书》面世了。

这套丛书，是由新加坡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组织编辑、由八方文化创作室出版、以“文化中华”为主轴的学术系列专著。

“新跃中华学术中心”成立于2012年元月。中心成立的宗旨，就是透过开展课题研究、出版学术专著、举办文化学术活动、设立与中华文化相关的研究项目，来提升社会大众对中华语言、文化及社会的认识和了解。

在研究方面，中心成立伊始，即确定下以“文化中华”为主旨的研究方向；强调不以政治实体或者地理位置来定义“中华”二字，而是以源起于中华大地、流播到五洋七洲的今日华夏文明作为“文化中华”的定位。这么一个“中华”，不是一个局限于地理意义的“中华”。身处世界各个不同角落的炎黄子孙都有自己在地的关注和思考。这样的关注和思考理当受到尊重和珍惜。因为只有这样多元、有容乃大的“中华”，才能在全球化、在地化、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二十一世纪中，让以华文来书写学术文章的学人畅所欲言，进而达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在这样的语境下，《新跃人文丛书》要为“文化中华”的多元性尽一份心、出一点力。除了先期推出的新马华文文学研究、华语应用研究、华文教材研究等专辑外，还有望推出其他研究专辑，包括历史、社会、艺术、戏剧、影视、媒体以及华流时尚等涉及中华人文的

课题。我们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举凡与华夏文明选题有关，不论是中国大陆还是港、澳、台，亦或是世界各地华人的人文现象，都会予以考虑，甄选之后纳入出版规划。

“新跃人文丛书”得以顺利面世，是从书各分册主编、作者以及出版社编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深知，要出版一套学术研究丛书，从选题的确定、作者的写作到出版发行，每一步骤都需要细心安排，慎重处理。我们感谢编委会委员以及各地学者给予的指导和支持。

《新跃人文丛书》是一片新开发的园地。在这块处女地的土壤下，蕴育各种可能，还有待关心“文化中华”的有心人去挖掘、灌溉、开发。中华文学、语言、教育、历史、社会、艺术、传播、流行文化，与全世界有华人存在的国家、社会的各种在地现象相互磨合、变异所产生出来的可能性是难以想像的。

这样的园地不能仅靠少数人来耕耘。它多元的本质，呼唤着更多各地各界卓有研究成就的学者专家参与。我们真诚期待社会各界的专家、时贤能为这一出版计划出谋划策，共襄此举。

是为序。

2012年10月15日

前　　言

罗福腾

“新跃人文丛书”第一分册《新马华文文学研究新观察》终于面世了！

新加坡新跃大学 (SIM University) 中文课程从1999年开始招收第一届学士班起，到现在已经有十四个年头了，毕业的学员上千人。后来，2005年陆续推出的中文硕士班、博士班，也有上百的学员学成离校。多年来，新跃大学中文课程累积了一大批学员们撰作的学士论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而这些论文就成为笔者编选“新跃人文丛书”的宝贵资源。

收入本册的新马华文文学八篇论文，几乎全部出自中文课程毕业生的学士和硕士学位论文。根据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有关新马文学流派、思潮与发展的宏观描述。胡玉欢同学的《诗乐历史的风灯：“南大诗社”与新华文艺》一文，集中记录分析了上世界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在新加坡本土流行诗乐活动的发展轨迹、经营与消费实践等，进而阐述了这一组织活动对本地文艺界带来的影响。黄治澎同学的论文《坎坷跌宕：马华左翼文学的奋斗经历》，历数马华文学在马共崛起、抗日时期、沦陷时代、战后阶段所走过的路程，为读者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勾勒出了马华左翼文学的发展线索。修读学士学位论文的同学敢于选择这类题目写作，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另一类论文是有关新马华文作家作品的解读和分析的。盛惠龄同学的《以读者为本——论〈骚动〉的阅读空间》是一篇质量颇高的论文。作者结合流行的阅读理论，从推远文本、拉近文本、保持

文本等角度论述人物形象、透视人物性格、阐释作家的创作手法，读来令人耳目一新。梁荣锦先生的《新兴文学的先驱者陈晴山》，开掘的是本地几近被忽略的前辈作家陈晴山的人生轨迹、创作活动以及文学作品。郭秀女同学的文章《长篇小说〈浓烟〉的多层面意义》，探讨的是马华作家林参天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社会意义、文学创作成就和价值。郑小燕同学的《从顺从走向自我：商晚筠小说的女性主义意识》，以马华文坛才女商晚筠的早、中、晚期系列小说为关照对象，重点分析了作家描绘的女性形象在日常生活中所体现的角色、精神风貌和意识形态。与前边数篇论文不同的是，康郁敏同学的论文《希尼尔笔下的“浮城”》，探索的是在新加坡区域文化氛围内所构建的“浮城”的文学世界，然后以符号学的理论为支点，解释希尼尔文学是怎样透过象征、符号、隐喻、叙事策略等来营造自己作品中的“浮城”现象的。学员初出茅庐，能够在借鉴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文学评论，是值得肯定的。鲁虎博士的论文《林连玉和李星可杂文的中国意识和华人身份论析》，通过对二人杂文内容的分析，诠释中国早期移民面对身份的认证、中国意识所采取的态度和立场。阅读之后，对了解和认识现今的社会现状，也是颇有辅助意义的。

把学位论文中的优秀论文结集出版，是自己执掌中文课程以来的一个强烈心愿。在尝试多次未果的情况下，这一计划一搁就是多年。幸好，时至2012年1月，新跃大学批准成立了“新跃中华学术中心”，大学学术顾问郭振羽教授出任中心主任。在郭教授的全面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学术中心为论文集提供了足够的出版基金和人力资源，终偿多年夙愿。毫无疑问，没有郭教授的鼎力推动，就不会有这本论文集的面世。在此，感谢郭振羽教授为提升新跃大学华文课程和学术研究作出的辛勤努力。

同时，还要感谢来自中国、台湾、香港、本地的各位编辑委员会委员对修改论文提出的中肯意见。各篇论文导师在指导学员写作过程中给予学员们的精心指导，已经记录在文末以示谢忱。在编辑和出版

过程中，责任编辑何华先生以及学术中心的符诗专博士、鲁虎博士等都给予很多帮助，笔者铭记在心。

由于受到篇幅的限制，收录进本论文集的文章，仅仅是从上千篇学位论文中挑选出的一小部分，还有很多优秀论文只好忍痛割爱。另有数篇虽已见于其他书刊发表，但鉴于水平较好，而且是本校毕业生作品，最终还是纳入本集之中。另外，由于这些论文写作的时间跨度有十多年的时间，而写作的体例、格式等前后出现多次变化，这可能导致论文集中的各篇文字体例未必完全一致，在此一并注明。欢迎读者朋友指正。

2012年10月1日
于新加坡新跃大学

目 录

总序	郭振羽	v
前言	罗福腾	vii
诗乐历史的风灯：“南大诗社”与新华文艺	胡玉欢	1
坎坷跌宕：马华左翼文学的奋斗经历	黄治澎	25
以读者为本——论《骚动》的阅读空间	盛惠龄	59
新兴文学的先驱者陈晴山	梁荣锦	113
长篇小说《浓烟》的多层面意义	郭秀女	135
林连玉和李星可杂文的中国意识和华人身份论析	鲁虎	177
从顺从走向自我：商晚筠小说的女性主义意识	郑小燕	195
希尼尔笔下的“浮城”	康郁敏	243
尤今作品语言修辞初探	李玉珠	295

诗乐历史的风灯

“南大诗社”与新华文艺

胡玉欢

一 绪论

新加坡南洋大学“南大诗社”为坚持实现文学多元化和文学创新的文艺观，于七十年代末将“现代诗”和“音乐”结合起来，积极创作了属于本土的歌乐——“诗乐”，为新加坡文艺界点起一盏别致的风灯。此后，“南大诗社”借助社区组织成立“阿裕尼文学创作与翻译学会”，继续掌持“诗乐活动”的发展，并把它扩展到社会上。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就“南大诗社”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诗乐活动的起落发展、诗乐的经营、消费实践和传播，作了初步的探讨研究，进而指出了它对新加坡文艺界的影响和价值。

(一) 研究目的

“南大诗社”是七十年代初、八十年代末新加坡诗乐活动的主要推动者，对当时的创作人来说，或许已成了尘封的记忆，但对成长于当时的许多大专学生和诗乐爱好者来说，却是隽永的生命插曲。当时，南洋大学（简称“南大”）正处巨变前夕，作为文学院一脉的“南大诗社”，凭着社员年轻的热忱，点燃一盏别致的风灯，清照文学创新和多元化的路向，“有乐的诗”因此在“新加坡华文文艺”（下称“新华文艺”）界得以驻足停留，铸刻下一道或深或浅的历史痕迹。

当年曾出席诗乐演唱会，而今依然留恋“那醒后的醉语，竟轻轻撩起我风里的往事，如少年的怅然，点点流过。”¹写这篇论文的目标，是要探索诗乐活动的发展起落以及它在新华文艺界的传播、影响和价值。有关于新加坡“以诗入乐”的书面论说，前面尽管有许多文化人、诗乐者和学者在他们有关的篇章中有零散的提及，但作为专门的论文或著作，在新加坡研究界尚未有专著出版。本论文将作开拓性的探讨，期望借此起着抛砖引玉的作用，为往后有意研究诗乐活动者提供翔实的参照资料。

(二) 研究内容与范围

本论文将探讨诗乐活动自“南大诗社”发端，经整合“变身”为“阿裕尼文艺创作与翻译学会”后的发展起落。本论文也将从文学经营和文学消费的角度，探索乐者的创作目标和心态，并论析读者出席诗乐演唱会的对诗乐表演的回应，进而评究诗乐活动在新华文艺界的传播、影响和价值。

必须说明的是，本论文所触及的范围启自“南大诗社”。当时的诗乐活动推动和主要的核心人物有周维介先生（笔名“周望桦”）、潘正镭先生（笔名“金雨田”）和张振源先生（笔名“张泛”）、杜南发先生等等。继后，诗乐演唱活动虽然以“新加坡青年协会”的名义主办，在“阿裕尼文艺创作与翻译学会”广纳新成员作为传承推进基地，都和“南大诗社”以及“前南大人”有密切的启承渊源，尽管当时“南大诗社”的名堂已不复存在。

“南大诗社”以及承后的“阿裕尼文艺创作与翻译学会”所拓展和主办的文艺活动内容多样化，除了诗乐活动外，还举办文学文艺展览、座谈会、出版刊物等等。本论文将以这两个血脉相关的文艺组织掌持的诗乐活动作为研究范畴。其它由“南大诗社”或“阿裕尼文艺创作与翻译学会”所推展的活动，暂不列入本文研究范围内，期待日后作进一步的研究。

¹ 杜南发诗、张泛曲诗乐《湖畔》，见《同温层》第2期（1981），页18。

(三) 资料搜集与来源

本论文的研究和写作是通过资料采集、综合、归纳、论析等方法进行。从新加坡国立大学“缩微胶片室”查阅的报刊资料、各类杂志、演出特刊、诗乐卡带、诗乐作品、进行田野访问时所收集的“口头资料”以及有关诗乐的学术文献都是论文研究的资料来源。

比较棘手的是，诗乐活动自开展到现在相隔二十余年，刻意收集有关刊物和资料者不多。因此，打听资料收藏者和辗转商借资料，就成了研究本论文时最迫切面对和必须解决的问题。

二 诗乐的经营和消费

(一) 关键词的界定

诗乐：“诗”是情动于衷，通过自我感情触动而作，是借重于文字的一种文学表现形式，也是诗者感情的呈现，具抒情性。把“诗”谱上同样表现情感，亦具抒情性的“乐”音符，就成了“诗乐”。换句话说，“诗乐”是两种不同文学艺术形式的结合体，结合后赋予“诗”新的艺术形式和生命，可以通过演唱的方式表现出来，甚至成为一项文艺活动展现于文艺界。

南大诗社：成立于1975年，是南洋大学校内的学生团体，集合了许多酷爱文学的青年学子，以写“现代诗”为创作主流，在学府推动诗的创作，出版诗刊《红树林》。文学创新与多元性是诗社经营文学的主要目标。诗社曾“以诗入乐”，带动本土文学与音乐的结合，成为七十年末、八十年代脍炙人口的文艺表现。在新华文艺的流程里，有组织的“诗乐”活动自诗社发端，社员们是照耀诗乐道路的“掌灯人”。

文艺经营：是一种精神物化的过程，表现在文艺创作与作品上，也表现在推动文艺活动的流程里。若把文艺经营停留在作者和作品的层面上，这将使它丧失一个重要的维面，那就是欠缺经历连续变化的经验视野，无法全面显现其价值。通过媒介传递，把作品引介到读

者跟前，有助于扩大文艺的经营层面。“南大诗社”的诗者写诗，乐者谱乐，推动诗乐活动，都充分体现了对诗乐文艺经营的实践。

文艺消费：中国童庆炳教授对广义的“文学消费”界定为：“是指人们用文学作品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的过程，也即文学阅读或文学欣赏。”² 至于狭义的“文学消费”即是“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印刷出版等传播媒介得到广泛运用的条件下，文学成为一种特殊商品以来，人们对它的消费、阅读和欣赏。”³ 就此而言，表现个人情感的创作，结合适当的“媒介”传达，让读者经历精神审美的过程，就是“文艺消费”的表现。“现代诗”是一抹重彩、一门精练的文字艺术，通过诗乐活动引介诗作，把作为观众的消费群带入特定的审美情感中，这些观众群就承担了“文艺”的“消费”。

新华文艺：自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原有的经济、文化等形态因政体而分割。由国家认同感的角度出发，我们界定“新加坡华文文学艺术”（简称“新华文艺”）是这个变迁后纯属“新加坡”这个国家的文学艺术。

（二）点起诗乐的风灯

诗者意念的浮现，乐者创作的冲动

诗者也是诗社主席的潘正镭酷爱音乐，在一些外国歌者的音乐世界里，欣赏到具诗质内蕴的歌曲，而当时充塞于七十年代中末期的是港台电影歌曲，以及曲高和寡的古典音乐。他开始寻思应如何在文学上创新与突破，一个“以诗入乐”的意念开始浮现：“为什么不叫我们的诗人写诗，找个有音乐感的朋友谱曲，谱一些属于我们土生土长的歌呢？”⁴

深厚友情基础，裨使潘正镭认定当时具音感又天赋好歌喉，曾有过以古诗入乐经验的南大音乐学会会长张泛是“承担”谱曲任务的上

²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页272。

³ 同前注。

⁴ 潘正镭《一个意念的浮现》，见《红树林》第3期，页8。

佳人选，于是他以玩笑的口吻要和张泛“潘诗张乐”的立下“口头合同”，请张泛为他所写的诗谱曲。

张泛的父辈是报人，自小触摸音乐，也有机会接触文学。对张泛来说，为现代诗谱乐无疑是新的尝试。当创作冲动在上课时随性而发，张泛给潘正镭传上字条，再接后者回传高中时的诗作《故事》，他就在下课后迅速完成了第一首诗乐的谱曲工作。资深文学推动与评论者周维介在受访时一再强调：“‘潘张’是诗乐的两个核心人物，本土诗乐的结合是由他们共同触发而成的。”

事隔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潘张在受访时肯定：诗乐的触发虽是个人创作欲的实践，但有组织性地推广诗乐活动，则是启自对本土华文文化深层的爱护。换句话说，诗乐活动的开展，背后却是源自当时高级知识份子对自我文化追寻的一种自觉。

(三) 掌灯的岁月之一：诗乐经营与消费的摇篮——“南大诗社”

1. 全国性诗展上——初试啼声

1978年8月5至6日，“南大诗社”在中华总商会展厅举办“诗展”。“诗展”展现的是诗与其它艺术形式的结合，从书画到雕塑等等，拓展了诗多样化的表现。在诗展的首晚，“南大诗社”特别在会场呈现由张泛和“南园小组”合唱的诗乐演唱，表达了南大学子的情怀，如：《故事》、《挥手》、《湖畔》、《屋外》、《上山》、《儒林道上》、《生命》、《告诉阳光》等等。当时是个诗者众、乐者寡的时期，诗者有周望桦、杜南发、潘正镭、陈来水、林山楼等等，而乐者主要是张泛。

潘正镭追述当时的盛况：“开幕典礼时人潮拥挤，尤其是在诗乐演唱时，许多后来者不得其门而入，唯有在场外侧耳聆听，真令我们感动……我们听到的都是掌声与赞美。”⁵诗展过后，潘正镭感叹道：“展后我们得不到半篇冷静后思索批评的文章。”⁶从这里可以

⁵ 同前注。

⁶ 同前注4。

肯定的是，经营者重视消费者的“检视”，对文艺趋优有着热切的追求，期待从消费者的反馈中吸取经验，以臻作品的完美。

事实上，“以诗入乐”的初次表现，与会者给予“有褒无贬”的态度，体现的是新华文艺界对“南大诗社”寄予的厚爱和厚望。诗人吴垠对“诗展”有这样的肯定：“诗与其它各类型艺术作形式上综合性的多面化演出，是观念，同时也是技术上的突破和创新，艺术类型彼此间的‘花嫁’却也说明了异中求同，艺术个别性外共通性的组合是可能可行而可取的。”⁷他激励说：“笔者在此敢论断，艺术类型的联姻正是一个有为的诗人落实可塑与可能性的野心表现。”⁸“诗展”的举办，确凿地实践了诗乐者从酝酿、创作到发表的“以诗入乐”意念，完成诗作从无声到有声的经营。

2. 云南园里——试验性的诗乐发表会

诗乐的初次表现深获好评，给予“南大诗社”极大的鼓舞，于是一个纯诗乐发表会便于1978年12月1日，在南大文学院举行。离校后的校友如周维介、杜南发等等，都毅然“回营”支持；乐者也从张泛、会华增加了周炯训、黄锦泉以及周维介本人。当晚，重现“诗展”上的诗乐外，也纳入新作。根据潘正镭的记述：“到场约三百名年青的观众中，端坐着全场的唯一文坛前辈，周颖南先生，他凝神的聆听并当场作诗来表达感受，作为年青的一群，我们珍惜这份力量。”⁹潘正镭的记述，表露了当年的文艺经营者确切需要来自社会的精神力量扶持。长者周颖南的出席以及他继后把“南大诗社”出版的《红树林》诗刊和有关诗乐活动的报道，分别寄送给中国文学家叶圣陶和文坛前辈林荫¹⁰，都一再体现他对“南大诗社”的赞许，并有意让文化母国资深的文化人，认同年轻的海外华族子弟对传承宏扬母国文化所作的努力。

⁷ 吴垠《诗的花嫁》，见1978年8月3日《民报》特稿。

⁸ 同前注。

⁹ 同注4。

¹⁰ 林荫《月色·潮声——诗乐旁听》中的《周颖南附记》，见1979年11月6日《南洋商报》副刊《艺文》。

“南大诗社”在云南园内推广诗乐，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许多悠扬悦耳、道出南大人心声的诗乐都成为校内学生常哼唱的歌，甚至选为参赛的歌曲。诗乐受到文化机构和传媒的重视，并在“亚细安学生节”的交流会上演唱诗乐，也为电视台摄录诗乐节目，还录制了“非卖品”卡带。

在沸沸扬扬的赞美声中，著名的乐者兼诗人郭永秀就诗乐内容、谱曲和演唱者的表演作出全面和具体的批评。他首先肯定“南大诗社”社员的表现：“这群有太多幻想和热忱的青年人，他们充满理想和创造力，写诗又写曲，把听众带入一个充满灵性与感性的世界。”¹¹他也激赏这类创新：“而如今，这群土生土长的年青人，却自己写诗，自己谱曲，自己主办这个‘诗乐演唱会’！”¹²郭永秀从形式和内容上提出看法：首先，他期待歌者改进表演方式，乐者提升谱乐和编曲技巧，加入各类型乐器，使曲调色彩多样化；其次，企盼诗者打破内容上“抒情有余而激昂不足”¹³的窒碍，深入社会。理解诗乐继存的脆弱。郭永秀提醒经营者：“一首歌，固然要有艺术性、娱乐性，若加上教育性，那样就充实的多了，而生命——生命也变得更有意义！倘若一味注重抒发个人的情怀，最后只好陷入流行歌曲的泥沼中！”¹⁴从这里，可以断定郭永秀极重视诗乐的成长，认为诗乐有别于流行歌曲，应当稳守其特质。回头检视，诗乐的发展一直都没有依附“流行”，或许是郭永秀当年的醒句，对经营者发挥了一定程度的告诫作用。

潘正镭特记郭永秀一笔：“在纯诗乐演唱会后，见诸文字的只有乐坛人士郭永秀先生的一篇文章，他鼓励我们，也从音乐的观点上写出了他对‘诗乐’的批评与建议。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文字。”¹⁵就

¹¹ 郭永秀《请听，我们这一代的声音！》，见1978年12月8日《星洲日报》，副刊《音乐》。

¹² 同前注。

¹³ 同注11。

¹⁴ 同注11。

¹⁵ 同注4。